



毛泽东研究丛书

国外 毛泽东研究述评

毕剑横 钱宏鸣 毕岚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GCHUBANSHE

毛泽东研究丛书

国外 毛泽东研究述评

毕剑横 钱宏鸣 毕岚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李子才

封面设计：孙 璐

责任校对：朱晓阳

毛泽东研究丛书

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

毕剑横 钱宏鸣 毕岚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169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3 字数 22.2 万 印数 1—1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0997-4/D·148 定 价：5.80 元

出版前言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空前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同他的光辉业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世界人民的心中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指引我们走向胜利的正确思想和理论原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指引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和将来也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有其固有的承继性。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毛泽东时代所开创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与发展。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宏富的精神遗产，必将在我们历史前进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研究这笔精神遗产，不仅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而且也将成为今后历史进程中的永恒主题。以毛泽东的生平、思想、理论与实践为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应当成为专门的重要学科，理应结出硕果。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向世界宣传毛泽东，让世界人民真切地认识和了解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他的伟业，他的思想，早已越出国界，举世瞩目。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对毛泽东的研究，并且涌现了大批颇负盛名的毛泽东研究学者，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理应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领先于世界各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毛泽东研究丛书”，就是想为中国的毛泽东研究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愿与有志于此的同道共同努力，把这一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更深的层次，取得更多的成果。

本丛书的宗旨，主要是从理论上高度肯定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所建树的不朽历史功绩，总结他提出的许多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阐发他的精神遗产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指导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严肃的科学研究，应当高扬唯物主义的旗帜。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

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①在毛泽东研究中，不可能也不应当回避他建国以后特别在晚年领导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所有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的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不可能超越他那个时代既有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不受到某种局限，错误总是难免的。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生前曾多次坦言自己犯过错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主要是从5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最严重程度“左”倾错误；另外，在他晚年也滋长了如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这样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唯物主义地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与总结，以防止我们今后前进中重犯他曾经犯过的错误，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特别是在分析他的错误时，我们力求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充分体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94页。

本精神。过激的态度和言辞，无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贬低毛泽东，无异于贬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在毛泽东研究中，无论是“左”的或右的思想倾向，我们都持反对的态度。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毛泽东研究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对逝者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宣传、学习他的品格、精神和思想，继承和发展他所开创的事业。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深化改革和实现腾飞的历史关键时刻，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坚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必将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回顾	(20)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及建国初期国外的毛泽东研究	(20)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外的毛泽东研究	(43)
第二章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毛泽东研究概况	(91)
一、日本的毛泽东研究	(91)
二、美英的毛泽东研究	(131)
三、其他国家的毛泽东研究	(152)
第三章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和热点	(180)
一、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方法	(180)
二、国外关于毛泽东生平事业及其思想发展的研究	(204)
三、国外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来源及其核心和本特点的研究	(234)
四、国外关于毛泽东方法论的研究	(261)
附 录 港、台地区的毛泽东研究	(278)
后 记	(281)

引 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毛泽东研究。此后，研究机构和团体纷纷成立，研究队伍的力量不断壮大，专业性的理论刊物开始创办，学术性的会议相继召开，从而使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有幸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宣传的行列，在从事科研活动和编刊的实践中，在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中，逐渐了解到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信息和动态，接触到国外有关的报刊和资料，阅读了国外毛研学者的一些论文和著作，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大为开阔，思路大为拓展。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到，作为毛泽东故乡的中国，在毛泽东研究上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本应在世界毛泽东研究领域独占鳌头，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却比国外落后了。特别是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无论在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学术著作的撰写和出版、科研机构的设置，以及研究队伍的成长等方面，都落后了一大截。这种不应有的“倒挂”现象，对于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国学者，特别是毛研学者来说，不能不感到愧疚。我们必须把压力变成动力，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要赶上国外毛泽东研究水平，就

必须先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学习和借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切积极成果，以推动我国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正是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动下，我们努力克服资料不足、水平不高等诸多困难，开始着手撰写《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一书。

在搜集整理资料、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对国外特别是美国、日本的毛泽东研究状况，都试图从“纵向”、“横向”和“深度”三个视角加以观察、分析和评价。

从“纵向”的视角观察，即从历史的角度，从过程和阶段上进行系统考察。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早在30年代，以斯诺为代表的一批西方记者，到延安等红色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访问，写出了如《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批资料丰富翔实、论述客观公允、语言生动形象的作品和人物传记。尽管这些还谈不上理论性、学术性的毛泽东研究专著，但却开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先河，在国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巨大社会影响。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引路人，他的巨人形象，引起了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对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60—70年代，国外毛泽东研究达到了高潮，在欧美和日本甚至出现了“毛泽东热”。这一时期国外毛泽东研究论著不仅数量上激增，而且理论性、学术性也显著增强。从论述毛泽东生平到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从整体上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到分门别类探研其在哲学、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发展，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到追溯其思想的理论来源等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因此国外学者称这一时期是毛泽东研究上的“十年繁荣时期”。当然，这一时期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严重影响到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如前苏联的学术界，为配合其领导人的反华活动，对毛泽东及其思

想就由理论上的研究变为政治上的反宣传，由基本肯定到全盘否定。西方和日本的一些毛泽东研究学者，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能冷静、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其学术著作中往往渗透着许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带有浓厚的极左色彩。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相继召开，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公正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并将其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严格区分。这些举措对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较深的学者，不得不进行深层次的反思，重新审视自己著述的一些观点。这一时期从现象上看，国外毛研著述显著减少，一度兴起的“毛泽东热”大大降温，似乎已跌入低谷。但从实质上看，国外毛研活动正走向深入，学者们通过理论上的反思，通过对中国新时期大量新情况的实际调查以及对一系列新的文献资料的研究，写出了一些为数不多，但却更有深度、更有份量的学术论著。特别是把“毛之后”与“毛时代”进行了比较研究，写出了一些有新意和创见的作品，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国外毛泽东研究在新的基础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从“横向”的视角观察，即从地域上，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全面考察，扫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概况。我们主要对欧美、日本、前苏联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毛泽东研究状况作了剖析。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中心之一是美国。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不仅有较长的历史，出现过繁荣的局面，而且它已成为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中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建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特别在一些名牌大学中，这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尤其普遍，其中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便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第二，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其中有不少国

际知名的学者，撰写了许多极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斯诺及其《西行漫记》自不待言，其他如费正清及其《美国与中国》、施瓦兹及其《“毛主义传说”的传说》、施拉姆及其《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特里尔及其《毛泽东传》、斯塔尔及其《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迈斯纳及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麦克法夸尔及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与费正清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沃马克及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弗朗西斯

苏及其《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等等。第三，形成了学派，开展了学术论争。最著名的学派有以费正清、施瓦兹为代表的自由派（亦称哈佛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亦称保守派）、以佩弗等人为代表的左派（亦称新左派）。在各个学派之间，曾经就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展开了多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论战。如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来源及其属性、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等问题，各派学者之间，各执己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些学术论争对于毛泽东研究的深入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另一个中心是日本。由于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历史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在毛泽东研究上有许多独具的优势。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毛泽东研究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仅由著名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就多达20卷，几乎全部汇集了毛泽东从1917—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全部文稿（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4卷已登载的文章除外）。这一大型的系列文献汇编，其重大的史料价值，已为各国的毛泽东研究学者所公认。二是涌现出一大批毛研学者，撰写和出版了大量的毛研论著，并在这些论著中，提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的除上面提到的竹

内实外，还有松村一人及其《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新岛淳良及其《毛泽东的哲学》和《毛泽东的思想》、野村浩一及其《文化与革命——毛泽东的中国》、宇野重昭及其《毛泽东》、德田教之及其《毛泽东主义的形成》、中西功及其《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等。这些论著在对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对作为毛泽东的思想基础的哲学思想等重要问题的探讨上，提出了一些颇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观点。三是建立了一些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宣传教育中心。如成立了以毛泽东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研究所和以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学院，在京都大学、法政大学、文教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最高学府中，也由一些著名学者领衔开展了毛泽东研究。此外，在毛泽东研究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也曾多次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争。

前苏联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毛泽东研究，也各具特色。

在前苏联，由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远在 20 年代就在其报刊上开始宣传毛泽东的生平和著作，这在国外是最早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中苏关系比较密切，前苏联的学者也十分重视对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1—3 卷，尤其是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和重点宣传，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自 60 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前苏联的毛泽东研究就完全从属于其反华政治目的，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就由基本肯定而变为全盘否定了。因此在这一时期，前苏联谈不上有任何科学价值的毛泽东研究作品。目前，独联体各国的理论界对毛泽东研究问题尚无暇顾及。

澳大利亚的毛泽东研究，在国外可称是后起之秀，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一些以毛泽东研究为主的学者已脱颖而出。如泰韦斯、尼克·莱特、格雷厄姆·扬等新涌现出来的学者，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多次到中国进行考察访问，他们运用新出版的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崭新的视角，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如泰韦斯参加了由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撰写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作专门研究；尼克·莱特对毛泽东哲学原著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的考证和评析等，都是颇有学术价值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普遍降温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毛泽东研究队伍却异军突起，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这是很可贵的。

此外，欧洲的英、法、德、意等国，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在毛研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从“深度”的视角考察，即从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考察。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普遍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毛泽东生平事业的研究。

国外的毛泽东研究是从西方作家和记者来华，对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访问、调查和对其生平事业的报道起步的。斯诺的《西行漫记》首开其端，随之出现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传记作品和研究性著述，其中又以施拉姆的《毛泽东》和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影响最大，也最富于特色。《毛泽东》是一部政治传记，它不仅记叙了毛泽东的生平事业，还探讨了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可以说融人物传记和思想历程为一体，因而更有理论深度。《毛泽东传》除全面叙述和评价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外，主要侧重于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曲折经历和复杂思想进行述评，这不仅涉及对毛泽东功过的评说，还涉及产生这些复杂思想的历史背景，以及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因而难度较大，现实意义也更强。尽管其中有不少观点和论述值得商榷，但这对一个外国作家来说，已是颇不容易的了。

第二，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的研究。

尽管国外某些毛泽东传记已涉及其思想的演变，但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史。在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上，施拉姆、沃马克、斯塔尔、韦克曼、金思凯等学者，均倾注了心血。他们一般都运用了史论结合的方法，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史专著。其中，尤以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沃马克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成就较大，影响较广。《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简明思想通史。作者从全过程上考察了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并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将其划分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两大阶段，每一大阶段中又划分了若干小的阶段，力图勾画出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尽管作者对其中若干小阶段的划分标准及论述中的某些观点，我们不尽认同，但他构建了这一系统工程，仍是值得称道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础》则集中论述从1917年到1935年，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其政治思想逐步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断代史。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在其政治思想形成时期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作者在撰写该书时所采用的动态性研究方法（尽管还有某些不足），对我们撰写毛泽东思想史是颇有启发的。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来源的研究。

这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又一热点。在美国和日本，许多著名的毛泽东研究学者，如费正清、施瓦兹、施拉姆、迈斯纳、格雷、格利、斯塔尔、松村一人、竹内实、屋崎庄太郎、大滨浩、加地伸行等人，几乎都投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中，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主要的有：①“马克思主义发展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是对其丰富和发展。②“民族传统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来源于中国民族历史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学说。③“两源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主

义，也来源于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只不过有的认为这二者是平行的；有的认为这二者有主次之分，或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或者认为以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主。④“异端论”，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但对此的解释则又有区别，一种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一种则认为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⑤“乌托邦主义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是来源于俄国的民粹派。⑥“人格论”，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心理历史的分析上来判定毛泽东的思想来源。⑦“自然科学论”，主要强调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诸如爱因斯坦学说等对毛泽东的思想形成的影响。此外，有的学者偏重于从语言词汇上去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来源，认为从毛著中对某种语言词汇使用率的高低，可探究出其思想的主要来源。上述各种观点，许多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但也有不少是比较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不过在一些片面的观点中，也含有某种正确成份。这就要求我们加以具体分析和鉴别，绝不能简单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是不足取的。

第四，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基本特点的研究。

上述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来源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触及毛泽东的思想属性及其核心、特点等问题，因而前面所提到的一批著名学者也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的论著中阐明自己的学术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基本特点是以农民为主体。理由是毛泽东历来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热情地支持农民运动，把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身上，而与工人阶级联系甚少，不重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对主要集中于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比较忽视。有的学者因此证明毛泽东这一以农民为主体的核心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不同，却与俄国民粹主义相似的乌托邦主义一致，如迈斯纳在其《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

主义》中，就反映出这种看法。在上述观点中，确认毛泽东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正确的。但由此说明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而将其说成与马克思主义迥异而与民粹主义相同的观点，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

二是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基本特点是以实践为主体。理由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又给予革命实践以理论指导，他不属于“学著型”和“工匠型”，而是属于“技师型”的革命家。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看，其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实践论，把实践放在首要的地位，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物质，过份强调了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有的学者还由此得出毛泽东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带有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色彩，如詹姆士·王就是持这一看法。在上述观点中，把实践作为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特征，这是正确的。但由此得出毛泽东忽视物质因素，甚而认为他是实用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三是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基本特点是以群众路线为主体。由于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创造出一整套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辩证地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而国外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群众路线是其思想核心和主要特点，这是正确的。但有的学者却将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用资产阶级的“自治共同体”来加以类比和解释，这当然就南辕而北辙了。

第五，关于毛泽东方法论的研究。

随着国外毛泽东研究向纵深发展，学者们愈来愈注目于对毛泽东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如弗朗西斯·苏、朱东逊、英汉蒂、怀利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著述问世。其中，尤以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概括和论述毛泽